



陳培珊 | 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重視體育課

推動全人發展

粵港澳成功合辦的十五運會，標誌着區域體育協作進入新階段，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向前推進的嶄新起點。這場盛會不僅呈現了高水平的競技比拚，更搭建了一個資源互通、經驗共享的平臺，為香港學校的體育發展帶來重要思考。綜觀本屆盛會，其影響力顯然超越了競賽本身。它折射出一種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新型合作形態——硬件設施聯通、專業人才互通、產業要素融通，正共同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區域性體育生態系統。置身於此網絡，香港的學校體育不應繼續停留在教育工程的邊緣位置，而亟需啟動一次從認知到方法的全面升級。

當前，香港學校體育課面臨一些深層挑戰。在偏重學術成績的整體氛圍中，體育課時常被壓縮，其功能被簡單理解為「課間放鬆」。課程設計缺乏長遠規劃與進階邏輯；運動空間受限的問題在稠密的都市環境中尤為突出；體育教師的職業發展與支持體系亦有待提升。更重要的是，體育的多元教育價值，如品格塑造、情緒管理、團隊凝聚力培養等，尚未得到足夠重視。這種相對局限的視角，可能讓本地體育人才的發掘與培養出現缺口，也令學生錯失了通過體育運動達成全面成長的重要途徑。

培養鍛煉習慣兼顧選拔體育精英

十五運會的組織與舉辦，恰好為香港學校體育課的改進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框架。

首先，構建連貫的課程體系至關重要。應當超越目前課時分散的現狀，設計一套覆蓋基礎教育與特長培養的漸進式方案。小學階段可聚焦於運動興趣啟蒙與基礎體能發展；中學階段逐步引入選修項目，並與社區體育組織建立銜接；高中階段則為展現出特殊潛質的學生提供更專業的訓練指導。這種「全面覆蓋」與「重點培養」相結合的結構，有助於實現普及運動與精英培育的雙重目標。

其次，探索靈活的「體教結合」機制。可以參考多方經驗，促進學校與專業體育機構建立穩定的協作關係。在保障學生正常完成學業的基礎上，提供系統化的運動訓練支持，並通過學分制、在線學習等彈性安排，有效平衡學術要求與訓練周期，真正體現對學生運動員雙重身份的尊重與支持。

再者，主動融入區域協作網絡。香港學校可

積極與灣區其他城市的院校及機構建立常態化交流，共同開展聯合訓練、舉辦友誼賽事、共享專家與設施資源。這類跨城互動不僅能提升運動技能，更有助於拓寬學生視野，增進他們對大灣區共同家園的了解和認同。

此外，營造深厚的校園體育氛圍是根基。學校應將運動精神有機融入日常校園生活，通過舉辦多元體育競賽、邀請優秀運動員進校園、表彰體育成就等方式，使崇尚健康、尊重拼搏、注重團隊的價值取向成為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體育教育是涵養家國情懷的有效途徑。體育運動中所強調的紀律性、集體榮譽感和頑強拼搏精神，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內涵天然契合。學校可通過組織觀看升國旗儀式、講述國家運動員為國爭光的故事、探討體育發展與國家強盛的關係，引導青少年在體育活動中深刻理解個人與集體、香港與國家之間血脈相連的關係。在團隊訓練與比賽中，學生能切身感受到協作的力量和為共同目標奮鬥的使命感，從而將愛國情感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追求。這種寓教於體的方式，生動而深刻，是培養青少年國家認同和社會責任感的重要契機。

藉體育課實踐「全人教育」

現代體育的意義早已超越身體活動的範疇。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備受關注的當下，體育活動是紓緩壓力、培養積極心態的有效手段；在未來社會更看重軟技能的背景下，運動場更是磨練溝通、協作、抗挫折能力和領導力的課堂。推動學校體育的發展，本質上是對「全人教育」理念的回歸與實踐。

十五運會如同一扇窗口，既讓我們看到現狀中的提升空間，也展現了區域融合帶來的廣闊前景。面對新的機遇，香港教育界需要以更創新的思維和更長遠的布局，重新審視體育在教育體系中的戰略價值。

讓我們把握這個歷史契機，讓體育從校園教育的側翼走向中央，不僅有助於學生在學術上精進，更能幫助他們在運動中鍛造強健的體魄、堅韌的意志和深厚的集體意識，香港的青年一代才能以更全面的素養和更自信的姿態，主動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世界舞台上，開創屬於自己的精彩未來。

美軍工複合體 操縱「中國威脅論」牟暴利

林志成 | 香港正思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近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台灣地區出售價值約110億美元的軍品計劃。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國第二度宣布對台軍售，也是美方歷來對台規模最大的武器銷售計劃。

1961年，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其告別演說中，向國民發出了一個日後被反覆引證的嚴厲警告：警惕「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對美國政治與民意的「不當影響」。這位五星上將出身的總統敏銳地洞察到，一個由龐大的軍事機構、軍火工業和部分政客構成的利益共同體已經形成，它有能力為了自身的生存與擴張，綁架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

塑造假想敵發「戰爭財」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審視華盛頓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時，便會發現艾森豪威爾的警告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具有了令人必須直視的現實意義。所謂「中國威脅」，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美國國家利益的客觀反映，而是這個軍工複合體為了自身利益，精心策劃、系統建構並強力推銷的一套敘事產品。理解「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必須深入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看清究竟是誰在從塑造「威脅認知」的過程中牟取暴利。

軍工複合體的核心，是洛克希德·馬丁、雷神、諾斯羅普·格魯曼等軍火巨頭。它們的商業模式天然具有「親衛突」的基因：和平與緩和意味着訂單的減少和利潤的下滑，而緊張、對抗乃至戰爭，則是它們財源滾滾的保證。冷戰的結束曾讓它們一度陷入「敵人缺失」的恐慌，隨後的「反恐戰爭」雖然提供了新的財源，但其規模和對手的量級，遠不足以支撐其對天量國防預算的渴求。因此，尋找一個新的、體量足夠龐大、技術水平足夠先進的「長期戰略競爭對手」，成為它們維持高額利潤的必然選擇。放眼全球，只有快速發展的中國，才能完美地扮演這個為美國軍費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提供正當性的「完美敵人」。

如果說軍火商是引擎，那麼華盛頓各大智庫就是為這台引擎提供「理論燃料」的大腦。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蘭德公司、哈德遜研究所等機構，源源不斷地生產着各類報告、文章和兵棋推演，從技術、戰略、意識形態等各個角度，論證「中國威脅」的嚴重性與緊迫性。然而，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背後，是清晰可見的利益鏈條。根據公開資料，這些智庫大多接受來自軍工巨頭的巨額資助。這種「金主」與「學者」的關係，決定了其研究議程和結論必然會服務於資助者的利益。它們並非在進行獨

立的學術探索，而是在為軍工複合體的產品進行「需求創造」和「市場預熱」，用學術的語言包裝赤裸裸的商業訴求。

官員游說軍火商供政治獻金

有了商業引擎和理論大腦，還需要將這一切轉化為實際政策的「傳動系統」，這便是由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游說集團構成的政治網絡。在華盛頓，「旋轉門」現象早已是常態：五角大樓的高官、國會議員及其助理，在卸任後無縫切換身份，成為軍火公司的高管或說客，利用其在政府內的人脈和影響力為老東家爭取訂單。根據統計，僅在2023年，美國國防工業的游說支出就高達1.4億美元，僱用了超過700名說客，其中近三分之二都是前政府官員。這些說客穿梭於國會山和五角大樓，用政治獻金敲開大門，用就業崗位（軍工廠通常設在關鍵搖擺州的選區）綁定議員的政治前途，確保任何削減軍費的提議都胎死腹中。

於是，一個自我循環、自我強化的利益閉環就此形成：軍火商出錢資助智庫，智庫製造「中國威脅」的學術依據；軍火商用金錢和選票影響議員，議員在國會推動增加國防預算；五角大樓獲得更多預算後，向軍火商採購更多武器；而為了證明這些武器的必要性，整個系統又需要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的嚴重性。在這個閉環中，中國的實際意圖和行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威脅」這個概念本身所能帶來的巨大政治和經濟利益。

這種基於內部利益驅動的「威脅塑造」，最終必然導向一種危險的「自我實現的預言」。美國基於這套敘事，在中國周邊加強軍事部署、拉攏盟友構建圍堵圈、研發針對性極強的作戰系統。面對這種步步緊迫的態勢，中國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應，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以捍衛自身主權與安全。而中國的這種正當防衛之舉，又會被軍工複合體及其喉舌解讀為「侵略性」的證據，從而開啟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螺旋。這套機制的危險之處在於，它並非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延續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靠問題而活。

中國的應對，不應是陷入對方設定的「威脅—反應」的邏輯陷阱，並與之進行亦步亦趨的軍備競賽，而應保持戰略定力，一方面堅決回擊不實指責，向世界揭示「中國威脅論」背後的利益驅動；另一方面，更要集中力量發展自身，以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國防現代化的穩步推進，作為應對外部風雲變幻最堅實的壓艙石。當中國足夠強大、足夠清醒時，任何被製造出來的「威脅敘事」，都將不攻自破。

強化身份認證技術 堵塞數碼驗證漏洞

陳穎峯 | 大灣區金融科技聯盟創會主席 大中華金融業人員總會副主席

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指他們涉嫌詐騙，利用偽造身份證，通過積金易（eMPF）平台的電子身份驗證（eKYC）功能，冒認他人身份開設戶口，由強積金賬戶盜取約180萬元。事件曝光後，積金易平台隨即暫停了電子身份驗證功能。這宗案件揭示了香港數字經濟與金融基建出現一個深層且亟需解決的結構性「痛點」。

要了解問題的癥結，首先要明白什麼是eKYC（Electronic Know Your Customer，電子身份驗證）。在本港，要在銀行進行開戶手續，客戶一般需要親身到分行，由職員親身核對身份證與申請者本人相貌是否相符；而eKYC，則是通過網絡平台，以容貌辨析技術完成身份驗證，取代銀行一向使用的驗證手續。

筆者早於2016年便參與創建全香港首間銀行的eKYC功能，見證了它的演變。一個標準而嚴謹的eKYC流程，包含三個核心步驟：驗證「真證」，即是由官方發出且未經篡改的證件；「真人」，即開戶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照片或影片；以及「人證合一」，即是開戶者與證件相片是同一個人。這三個步驟環環相扣，構成了線上開戶的安全防線。

香港缺乏「權威來源」核證

然而，從2016年初創到今天，香港的eKYC始終面臨一個巨大的痛點，就是缺少即時核驗的權威數據庫。

在金融科技領域，政府的原始數據可以稱為「權威來源」（Golden Source）。以內地為例，金融機構可以對接直屬公安部的「全國公民身份證號碼查詢服務中心」（NCIIS）。銀行上傳客戶的身份證號碼、姓名及照片時，系統能即時比對公安部的數據庫，反饋證件的真偽及人臉匹配度。新加坡的Singpass系統亦有類似功能，在得到客戶授權後，商業機構可以進行高效準確的身份驗證。

至於香港入境事務處的身份證數據庫，長期以來不對商業機構開放。這導致香港包括銀行、積金易等金融平台在進行eKYC時，處於一種「盲測」狀態。機構無法比對客戶提交的資料與入境處的「權威來源」是否一致，只能依賴手機鏡頭拍攝的身份證，再透過光學字符識別（OCR），或者人工智能（AI）算法分析證件上的防偽特徵（如微縮印刷、字體凹凸等）判斷真偽。

在AI技術尚未普及的十年前，這種依賴機器視覺識別的方法尚算可行。然而，隨着生成式AI（Generative AI）技術逐漸成熟，深偽（Deepfake）技術已經發展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以這次詐騙積金易平台案件為例，警方指出詐騙集團使用的是「高仿身份證」。在今天，不法分子利用生成式AI技術，不僅能合成出像真度極高的假身份證圖像，甚至能模擬防偽特徵，達到騙倒傳統eKYC系統「機器視覺分析」的程度。當銀行和金融平台無法驗證到「真實證件」，又無法連接官方數據庫實時，單靠分析一張經手機拍攝的照片，用「傳統機器視覺」應付「生成式AI深偽」，便顯得脆弱無力。這正是積金易平台被攻破的根本原因。

防範有人用深偽技術進行詐騙

針對這次漏洞，有科技專家建議轉用「智方便」（iAM Smart）進行認證。筆者表示認同，這是現在最就緒的「止血」方案。「智方便」作為目前唯一能直接聯繫入境處系統的數碼身份認證工具，背後連接的正是非常重要的「權威來源」。透過「智方便」，金融機構可以確保開戶者經過政府核實的真實身份，抵擋深偽身份證的攻擊。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應只有一個應用程式支持整個金融系統的身份認證。有關政府部門應審視現時運作，在保障私隱及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參考內地NCIIS或新加坡的模式，開放身份證核實服務的應用程式界面（API），容許持牌銀行和受監管金融機構（包括積金易平台），在獲得用戶授權後，直接發送身份驗證請求到入境處系統，核實申請人資料。例如，機構上傳身份證號碼、姓名、照片等資料，入境處系統只需回復「是/否」或「匹配度」，過程無需回傳敏感的個人訊息。

積金易平台詐騙案已經為香港敲響了警鐘。今天生成式AI技術快速迭代，僅依賴「機器視覺分析」，即使加上「人眼覆檢」驗證身份證件的方法已經不足。電子身份認證eKYC是數字經濟的基石，也是金融基建非常核心的一部分。唯有打通政府數據庫與金融體系之間的壁壘，實現真正的「源頭核證」，才能從根本上堵塞漏洞，保障金融安全，守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以至智慧城市的長遠發展。



芷江受降警醒未來 銘記歷史堅韌自強

詹培勳 | 中國僑聯青委



筆者近日到訪湖南芷江。說來慚愧，這個名字過去並未真正進入筆者關注視野，但正是在這個並不起眼的小城，中國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幕——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大陸正式簽署投降書。歷史在此定格，中國人在經歷八年浴血抗戰後，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抬起了頭。

芷江受降，並非一場簡單的儀式，而是一場極其莊嚴、嚴謹、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歷史時刻。1945年8月，日本陸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在此代表日方簽署投降文件。這不是海外戰區的間接安排，而是在中國土地上、由中國軍隊主導的受降。這一刻，既是抗戰的終章，也是民族尊嚴的復歸。

行走在芷江抗日勝利受降紀念館內，歷史並不喧嘩，卻令人久久不能平靜。斑駁的史料、嚴整的受降流程復原、細緻的文獻紀錄，都在提醒後來者：這場勝利從來不是輕而易舉。中國付出了超過三千五百萬軍民傷亡的巨大代價，才換來這一紙投降書。

芷江的意義，還不僅於此。這裏曾是中國重要的航空樞紐之一，也是飛虎隊活動的重要區域。在中國空軍處於絕對劣勢的年代，美軍飛虎隊協助中國建立空中防線，參與機場建設、飛行訓練和作戰支持，為中國空軍爭取了寶貴的生存與成長空間。芷江空軍學院的存在，正是中國從被動挨打到逐步具備空中反制能力的歷史見證。

這種從極端劣勢中奮起的歷程，今天看來尤為值得珍視。今年是中國人民抗

日戰勝利80周年，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內的日本政客不時發表錯誤、危險言論，再次觸動歷史傷痕。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有幸來到芷江，更加深切體會到：歷史從不是用來消費仇恨，而是用來警醒未來。

對香港而言，這段歷史同樣並不遙遠。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歲月，是香港社會無法迴避的集體記憶。無論是烏蛟騰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營救文化人士，還是港九大隊的艱苦鬥爭，香港在全民族抗戰中從未缺席。只是，在快速城市化與世代更迭之下，這些記憶需要被更系統地保存、講述與轉化。

從粵港澳大灣區的視角看，將國家級抗戰記憶設施蘊藏的精神內涵與香港的抗日歷史資源進行串聯，本身就具備現實意義。一方面，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與延續；另一方面，也為紅色文化、愛國教育與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間。通過系統梳理抗戰遺址、策劃跨區域研學路線、結合現代展陳與數字技術，讓年輕一代「看得見、走得到、記得住」，不失為一條值得探索的路徑。

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它建立在對歷史的敬畏之上，也建立在對未來的共同守護之中。芷江受降告訴我們的，不只是勝利本身，更是一個民族在最黑暗時刻仍然選擇堅韌、團結與自強的答案。今天重訪芷江，是為了更清醒地走向未來；記住戰爭，是為了不再重演戰爭；珍愛和平，才是對歷史最好的致敬。